

留在大地上

的 多 少 心

Liuzaide Dadishang de Zuji



蒙古族国际交通员杨宝山的革命生涯

阿云嘎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留在大地上



蒙古族国际交通员杨宝山的革命生涯

阿云嘎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在大地上的足迹：蒙古族国际交通员杨宝山的革命生涯/阿云嘎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2
ISBN 978-7-5035-4108-7

I. 留… II. 阿… III. 杨宝山 (1915~1994) -传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2478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 62805800（办公室） (010) 62805818（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8.5

字数：88 千字

定价：21.00 元

责任编辑 王琪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王巍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序

序

杨达赖

杨宝山同志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草原上成长起来的一位老革命同志，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杨宝山同志向来以忠诚老实、团结同志、一身正气、密切联系群众闻名。

对他传奇式的人生革命经历，有不少人是不清楚的。他从不宣扬自己，更不表功。而他不平凡的革命经历，却向人们展示了他的为人和高尚品德，从而给人们留下了不可忘怀的印象。

我与杨宝山同志，相识在50年代末的鄂托克旗。那时，我是书记，他是副书记，我们朝夕相处，团结战斗了三年多。60年代，我们又先后调回盟里工作，我为盟委副书记、书记，他为盟委统战部副部长、盟政协副主席，后来又共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这漫长而不平凡的岁月，我们是亲密的战友，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互相鼓励；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互相支持。就这样，我们从中年走到老年，又相伴走过老年……留下来的是永远不可忘怀的

友情，一个真正同志间的友情。

然而，他传奇式的革命人生经历及他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我还是知之不多，了解尚少。在此，我特别感谢作者，为社会奉献了一部难得的史料，为后人提供一部革命传统教材。

革命的路程依然漫长，我想无论是怎样的一生，能为历史留下点精神或物质的东西，应该就算是无悔的一生。

让永恒的战友之情长存！

2004年3月1日 于呼和浩特

(序者是原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目 录

第一章 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 (1)

1. 1949, 秋天的一个傍晚 (1)
2. 谁是“杨宝山”? (5)
3. “鄂托克旗的西边” (8)
4. 珠和这个地方 (10)
5. 一个叫孟克敖其尔的牧人 (13)
6. 孟克敖其尔就是杨宝山 (16)

第二章 投奔革命 (19)

1. 找红军去 (19)
2. 定边街头的蒙古族小伙子 (23)
3. 陕北好风光 (28)
4. 延河滚滚 (31)

第三章 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36)

1. 晋西北见贺龙 (36)
2. 巍巍大青山 (41)

3. 凉城之旅 (44)

第四章 党选择了他 (48)

1. 再回延安 (48)

2. 李富春亲自对他进行考察 (51)

3. 他被正式任命为国际交通员 (54)

第五章 茫茫草原路 (57)

1. 穿越大草原 (57)

2. 在中蒙边境 (70)

3. 乌兰巴托 (73)

4. 鞍不离马，人不离鞍 (75)

5. 护送中国学员 (78)

6. 偶遇郝登鸿 (82)

7. 遭遇敌人 (84)

8. 奉命再回延安 (87)

第六章 回故乡潜伏 (91)

1. 重回鄂尔多斯 (91)

2. 进入城川 (93)

3. 家乡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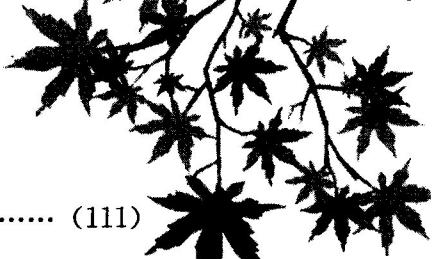
4. 接受潜伏命令 (100)

5. 打入“西官府” (100)

6. “干饭管家” (102)

7. 周仁山与鄂托克旗“夺印”、“护印”斗争 (103)

8. 接头 (107)



目
录

9. 遇天宝	(111)
10. 迎接曙光	(113)
第七章 尾声	(116)
曲折而平凡的人生	(118)
杨宝山的生平简介	(125)
跋	(127)



第一章 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

1. 1949，秋天的一个傍晚

1949年初秋的一个傍晚，刚刚成立的鄂托克旗临时自治政务委员会驻地——阿日勒庙（曾写作“阿拉庙”）。那时候鄂尔多斯地区还归绥远省管辖。

干旱的草原上，初秋的傍晚宁静而美丽。这个地方又刚刚解放，在宁静中又透着一种蓬勃。四周的草滩、沙梁和高地上因为雨水充足而飘浮着淡蓝色的雾气，阿日勒庙的经堂和周围那些建筑沐浴着晚霞，看起来就像一幅油画。

阿日勒庙的规模不算小，据有关资料记载，这间佛教寺庙始建于1731年，1919年翻修，正式名称为“热喜却岭”，民间俗称阿日勒庙。这个地方在全鄂托克旗也很有名气。但阿日勒庙这个地方之所以扬名并不是因为它的规模大或者其宗教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它当时在鄂托克旗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所处的地位。要叙述解放前鄂托克旗发生的好多事件，都离不开这个阿日勒庙。

让阿日勒庙最先出名的，应该首推这个寺庙的四世沙卜

隆章文轩，他是鄂托克旗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章文轩藏名沙德如布且毕扎拉森，蒙古族，又名扎木扬什日布，鄂托克旗苏米图人。苏米图与阿日勒庙相隔 200 里之多，但章文轩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阿日勒庙，变成一个全旗政界、军界权力显赫的人物。加之他幼年被选定为阿日勒庙沙卜隆，有一段时间也主持过这里的庙务，甚至还取得过“堪布”称号，民间便称他为“阿日勒庙喇嘛”。他最后又在这里被自己的部下秘密勒死，历史上称这件事为“阿日勒庙事变”。

说是“沙卜隆”，章文轩却曾集全旗旗务和军事大权于一身，曾任绥远省政府任命的旗保安大队长、宁（夏）鄂（托克）边界巡防司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第八战区伊南游击司令等要职，阿日勒庙便成了全旗甚至整个伊西地区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住在这个地方时，确实办了一些大事。他曾从这里出发南下杭州，将九世班禅请到鄂托克旗；又从这里出发北赴乌兰巴托，出席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还亲自出面，从边商手中将碱湖、盐湖经营权收回旗里，把旗府几十年的债务还清；又与天主教会谈判，解决了教地赔款的归属权问题；他曾经在这里成立了旗立第一所小学——阿日勒庙学校；他还曾与“独贵龙”运动的著名领袖席尼喇嘛、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负责人郭道甫和白云梯、宁夏军阀马鸿逵等有过密切来往，而且与共产党的周仁山、赵通儒又是拜把子兄弟。

章文轩出名，阿日勒庙也跟着出名。凡是知道章文轩的人，自然也都知道有个阿日勒庙。



这个地方出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发生过上面提到的“阿日勒庙事变”，又称“阿日勒庙事件”。发动者是三个人，马富纲（巴音道尔吉）、马良诚（宝日巴特尔）、顾寿山（乌力吉胡图）。这三人当时都是章文轩的部下，但他们与共产党在鄂托克旗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都有过密切的接触和来往，同时对章文轩的飞扬跋扈大为不满。他们是一些有才华、有胆略的年轻军官，阅历丰富，满腔热血，愿意为家乡奉献一切。这三个人于1946年1月13日发动了事变，扣捕了章文轩，并于1月14日将其秘密勒死。

事情仅仅过了一年，1947年10月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阿日勒庙办事处”。这是旗里的反动势力在国民党特务的煽动支持下搞起来的机构，管辖鄂托克旗西部八个地区的行政事务。

又过了两年，1949年7月15日，“阿日勒庙办事处”处长升济密图（又写做什济秘图）下令扣捕驻在这里的十几个国民党特务，公开宣布起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历史把阿日勒庙选做了一个大舞台，一出又一出活剧在这里演出，使全旗全盟都向它注目。所以，当旧的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刚刚掌权的共产党人将阿日勒庙选定为旗政权机构的驻地，似乎也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历史进程到1949年夏秋季，好像突然加快了它的运行速度。封建统治体系分崩离析，国民党反动势力大势已去，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已经进入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阶段，而且发展迅猛：

1949年8月23日，鄂托克旗宣布和平解放；

同年9月7日，鄂托克旗临时人民自治政府在三段地成立：

9月中旬，临时人民自治政府迁到阿日勒庙。

寺庙仍然在，过去章文轩司令部和“办事处”的那些房子当然也在，但现在这些建筑都更换了主人。这里曾经暗藏杀机，这里曾经枪声震天，这里也曾经人去屋空，一片死寂。但这一切都变成过去，现在这里有的是平和的景象、忙碌的人影，还有干训班学员的歌声。原来的学校和司令部的一些房子都挤满了人不说，周围还搭建了很多蒙古包和帐篷。简陋归简陋，但也没有其他办法。旗委、政府两大班子及其职能部门要办公，部队要驻扎，干训班要上课，卫生科的门诊和病房要开张，还有后勤部门要仓库，作战部门要设指挥所，甚至保安科还需要一些房子用于关押犯人，原来的房屋根本就不够用，只好临时搭建蒙古包和帐篷来对付。共产党人刚刚夺取了政权，在其行使权力的初期阶段，一切都必须因陋就简。

但不管怎么说，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这里终于被翻过去了。

炎热的一天终于过去，落日的余晖却仍然停留在这一片广袤无边的荒漠草原的西部天空，久久不肯退去。按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的作息时间，这时候应该已是下班时间。但在当时，作息时间还没有公布，而且事情确实千头万绪，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以及工作人员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骑马的流动哨兵在远处游动，一些军人在草滩上遛马，干训班的学员在露天学唱革命歌曲，扫盲班学生走向临时教室，秘书、警卫人员更是忙着进进出出。



一个忙碌而又平常的傍晚。

就在这个傍晚，刚刚上任的鄂托克旗领导者们走进会议室，开始研究一封来信。

2. 谁是“杨宝山”？

又是一封寻找“杨宝山”的来信！

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封了，他们最近经常收到这样的来信，这些信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都要求鄂托克旗的领导人寻找一个叫杨宝山的人。这些信有的来自中央有关部门，有的来自解放军各军兵种，有的来自有关省市自治区，而在信末尾的署名者更是赫赫有名：周仁山、天宝、白如冰、吴德峰……

从来信的内容看，这个叫“杨宝山”的人是蒙古族，鄂尔多斯鄂托克旗人，而且是个老革命，先后在延安、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工作过。有的来信还提醒鄂托克旗的领导人，可以向李富春、贺龙等高级领导人询问杨宝山的下落。

所有这些无不说明这位“杨宝山”不是一般人，但这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

鄂尔多斯是革命老区，鄂托克旗西部在1936年就有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所以当时鄂托克旗的领导人无一不是老革命。他们在鄂托克旗这片土地上出生入死多少年，不要说对鄂尔多斯地区的革命队伍，就是对陕甘宁地区的人员都很熟悉，但他们现在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杨宝山到底是谁。他们将那封信放在桌子上，大家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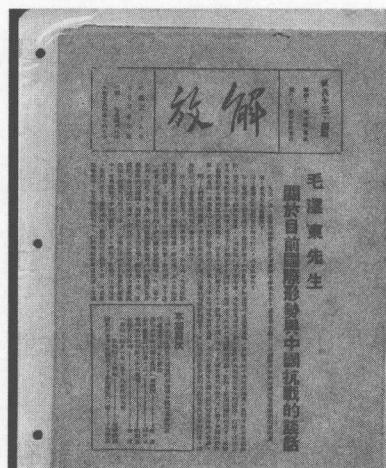
坐在一起，把各自认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过滤着，从司令员、师长一直到营连排长，从司号员、通讯员到伙夫、马倌，挨个地想了一遍，最后还是跟前几次一样不得不再次放弃了努力。但他们又想起一个办法，那就是大家给自己所认识的一些“老革命”写信，打听一下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叫杨宝山的人。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他们走出会议室又忙其他工作去了，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却始终在他们的脑海里转来转去：

这个杨宝山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那些来信会不会把地点弄错了？

他是不是早已牺牲……

过了一些时日，发出去的信有了回音。



杨宝山保存的《解放》报

曾在乌兰察布盟凉城县一带打游击。我记得他的确是蒙古族，因为他说汉语总带着蒙古语调。后来他突然不见了，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甚至原来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同志也有了回音：

“……是有一个杨宝山。贺龙同志曾接见过他。但后来

“……有杨宝山这个人，蒙古族，曾在中央党校民族班学习过。”一封来信说，但接着又说不清楚了，“后来我们都毕业了，他好像又接着学习，后来就不清楚了。”

又有一封信说：“我所认识的杨宝山是绥东工委委员，



就不见了。据说，大青山李井泉支队曾派出一个骑兵连把他接走了。”

原来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也来信说：“大青山确实有过一个杨宝山，是蒙古族。但我们打交道不多。现在回想起来，他好像是个部队首长，因为我记得他挎手枪……”

看着这些来信，当时鄂托克旗的领导者们简直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些来信确实都提到了一个叫杨宝山的人，但延安在陕西，贺龙当年在山西，绥东工委在乌兰察布盟丰镇一带，而大青山在呼和浩特以北。他们说的杨宝山是同一个人吗？可也奇怪，信中所提到的这几个“杨宝山”的确有些共同之处：他们名字相同，都是蒙古族，而且都说不清楚他从哪儿来，又去了什么地方，简直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秘得很。

正当鄂托克旗的领导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正式来函为他们解开了这个谜。

西北局的来函简短而又明确：“杨宝山同志是鄂托克旗珠和人，蒙古族。系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国际交通员。他于1948年奉命回到鄂托克旗潜伏下来。因为杨宝山同志属于我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秘密战线，他的情况只有中共中央机要交通局掌握。根据我党已经在全国夺取政权，秘密战线工作已有很大的变化，经我们请示中央决定，要公开杨宝山同志的身份，为他安排工作。”西北局要求鄂托克旗尽快找到杨宝山，并把情况及时报告当时的伊克昭盟党委。

西北局的来信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杨宝山八成在他的老家——鄂托克旗一个叫“珠和”的地方。

3. “鄂托克旗的西边”

鄂尔多斯的民歌中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歌曲，歌名叫《鄂托克旗的西边》。

那是一首爱情歌曲，曲调优美，歌颂了对爱情的忠贞。这毫不奇怪，凡是以爱情为题材的民歌都这样。但这首《鄂托克旗的西边》却又表现了另外一个主题，那就是对权力与财富的蔑视。

绿松石和珊瑚的头饰
我并不稀罕
你那聪明和善良
使我迷恋……

也许，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首歌曲，正是因为它表现了鄂托克旗西部人民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同时，这首歌还给人们提示了一个地域概念：鄂托克旗的西边。

何为“鄂托克旗的西边”？其实就是对鄂托克旗珠和、吉拉、城川等地方的统称。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地方统归鄂托克前旗，这是后话。

而在当时，鄂托克旗还没有分为前后两个旗，那时候只有一个鄂托克旗。

“鄂托克”一词在蒙古族经典史书里可以寻得到，是指“营”或“部”。“营”是兵营或者“牧营”，“部”就类似于部落。后来到了元、明两朝，这个词便有了更为明确的涵